

中国近代文论选



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 罗根泽主编

中国近代文论选

上

舒芜 陈迺冬 编选
周绍良 王利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 罗根泽主编

中国近代文论选

下

舒芜 陈迺冬 编选
周绍良 王利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中国近代文论选（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8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6\frac{1}{2}$ 插页 4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15,001—32,000

书号 10019·1367

定价 2.65元

前 言

本書所選中國近代作家論文學的詩文二百四十餘篇，略按時代，分爲三輯：第一輯，自鴉片戰爭前夜至變法運動前夜；第二輯，戊戌變法前後；第三輯，自辛亥革命前夜至五四運動前夜。但所謂辛亥革命前夜，可以緊接着戊戌變法失敗後算起，所以第二輯和第三輯的時間是交叉的。

每輯之內，略按流派，分若干單元；各以先進的、革命的流派冠首，次以落後的、反動的，以見一時期的主流和主要的矛盾，然後是其他。

第三輯末，魯迅的摩羅詩力說一篇爲一個單元，以結全書。

一

第一輯六個單元：一、早期改良主義者；二、太平天國；三、桐城—湘鄉派（附陽湖派）；四、「文筆論」一流；五、宋詩派；六、漢、宋調和派。

這時中國開始淪爲半殖民地，瓜分之勢，日漸形成。有識者已經看出，非有一番改革，不足以應

此空前巨變。以魏源、龔自珍爲代表的早期改良主義者，開始向西方尋找真理，鼓吹變法，爲後來變法運動的先驅。太平天國的革命家，抱着小農平均主義的幻想，實行武裝起義，以推翻清朝的封建統治。清朝統治者對外完全沒有能力保衛國家，對內堅持腐朽的統治，更勾結外國侵略者，血腥地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但人民力量的震撼，也使統治階級內部日益分化，形成複雜的矛盾。所有這些矛盾鬥爭着的社會力量，無不力圖掌握文學的武器，反映爲文學思想上的矛盾鬥爭，焦點便是文學發展道路的問題：時代變了，文學變不變？怎樣變？

清代文壇原以桐城派爲正宗，他們標榜孔、孟、程、朱的「道統」，韓、柳、歐、蘇的「文統」，以及二者結合的所謂「義法」，爲所謂康、雍、乾「盛世」的「鼓吹休明」。這時，改良主義者首先起來，向這個正宗進攻。他們主張，文學上和政治上同樣要變法，文學上要衝破「道統」「文統」「義法」的束縛，政治上要衝破「祖宗成例」的束縛；文學解除了舊的束縛，纔能够真實地反映新的現實，發揮「批判的武器」的威力，爲政治上的變法服務。王韜我詩所謂「貴篤摯」，「別真僞」，「但知吟亂離，不能飾平治」，最能表明忠於現實、勇於暴露的意思。

太平天國的革命家們，主要用的是「武器的批判」，但也要求「批判的武器」爲之服務。他們主張，文章的內容和形式都必需適合新建立的革命政權的需要。在他們面前，不僅是桐城派的問題，「凡前代一切文契書籍不合天情者，概從刪除，即六經等書，亦皆蒙玉筆改正。」他們所說的「文以記實」，「言貴從心」，以「虔恭之意」，爲「切實明透」之文，樸素而有力地陳述了現實主義的萌芽思想。

桐城派這時，大師姚鼐已死，所謂姚門四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鼐），對新的局面都有些應付不了。方東樹害怕以變應變，會迷失封建主義的根本方向，只好主張以不變應萬變。梅曾亮主張『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而以官僚鎮壓『悍民』時與『督糧』時方法不同爲喻，似有意朝更反動的方向變，可是拿不出有效的辦法。這時曾國藩出來了。這個大劊子手看中了桐城派，要使它變得更適合於反動政治的需要，於是以所謂『經濟』，即直接爲反動政治服務，擺在首位，代替了『義理』空談。又極力誣譏太平天國摧殘文化，吹噓自己保障文化，使桐城派政治上和文學上都向他歸附。他所謂『文章與世變相因』，便是以湘鄉派篡桐城派之統，穩住了桐城派已亂的陣綫。

自阮元開始的『文筆論』一流，却從背後向桐城派進攻。他們不是同一派別，但一致持所謂『文筆之辨』，以韻偶爲『文』，無韻散行爲『筆』，謂唐、宋八家之作只是『筆』而不是『文』，同時反對理學，挖桐城派的兩條老根。蔣湘南以『奴、蠻、丐、吏、魔、醉、夢、喘』八字形容桐城派，可謂窮形盡相；他對龔自珍、魏源很是稱許，又似乎和改良主義者遙相呼應。包世臣並不談『文筆論』，且於所謂『選學』亦有微詞，但是他反對韓、柳等『門面言道』，反對歸有光等人以八股眼光推崇八家，主張『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國家』，所論多有卓識，姑置於此。

以鄭珍、莫友芝爲代表的宋詩派，則與桐城—湘鄉派相聯繫而又有不同。他們大抵是一些『安貧（？）樂道』的書生，對時代的巨變似乎不即不離，一味追求一種蕭瑟而寧靜的詩境，在裏面『讀書

「養氣」，自命「不俗」，歸根結蒂是逃避，也就是統治階級內部一種離心傾向。這以前，王士禛和沈德潛相繼爲清代詩壇盟主，都標榜唐音，鼓吹「盛世」，至此一變，日趨暗淡了。

至於漢、宋調和派，原來都是努力調停於考據家和理學家之間的一些學者，論文學，也努力調停六朝文與唐、宋文、唐詩與宋詩等等的紛爭。這類的調停照例是徒勞，不過它的出現，也照例是矛盾尖銳、瀕臨爆發的標識。

這一時期文藝思想上矛盾鬥爭的結果，是動搖了桐城「義法」的統治，初步樹立了文學必需隨時代而變化的觀念。封建正統的宋儒理學，已經拿不出場，曾國藩承認：「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這是文以載道的破產。改良主義者在這場鬥爭中有卓越的貢獻。至於太平天國革命思想的實際影響，則不能僅就文學的範圍而論。

二

第二輯六個單元：一、改良主義者；二、洋務派；三、桐城—湘鄉派；四、略承「文筆論」遺緒者；五、常州詞派；六、宋詩派。

這個時期大致從中法戰爭開始。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清朝十年兩敗，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完全成熟，亡國危機迫在眼前，激起人民運動進一步高漲。兩次戰爭中，曾國藩、李鴻章以來洋務派官僚全力經營的南北洋海軍，相繼覆沒，宣告了他們的「富國強兵」的口號的破產。改良派同

洋務派劃清了界綫，在康有爲的領導下，把變法言論的鼓吹，發展爲實際的政治運動，爭取一個不要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憲法。一八九八年（戊戌）得到有位無權的清光緒帝的支持，開始實行新政，準備立憲。以慈禧太后爲首的大權在握的頑固派，仇視這個進步的運動，也不容許光緒帝藉此來爭奪統治權。變法運動在頑固派的鎮壓之下，很快失敗了。改良派以國外爲基地，繼續向頑固派鬥爭，向羣衆進行啓蒙運動，可是堅決拒絕同革命民主派合作，兩派開始發生矛盾。在變法和反變法的鬥爭中，洋務派官僚張之洞起先想拉攏改良派，後來發現利用不了，很快便成爲文化戰綫上反變法的先鋒，終於成爲直接鎮壓唐才常起義的血腥的兇手。這個時期的變法和反變法的鬥爭，是上個時期的直接的繼續；這個時期文藝思想上矛盾鬥爭的焦點，也仍然是上個時期尚未徹底解決的文學變不變，怎樣變的問題。

以康有爲爲首，以梁啓超爲主將的改良派，繼承魏源、龔自珍的傳統，堅持了文學要變，要爲變法運動服務的主張，進一步着重明確了怎樣變的問題。他們的貢獻在於把這個問題同普及的問題，同向西方學習的問題聯繫起來，於是中國文人從來看不起的小說，第一次被他們提到極高的地位。他們關於小說的理論，有了相當完整的一套；而對於小說的社會教育作用的強調，對於政治性和普及性的強調，是其中最爲突出的論點。不過他們和一切啓蒙主義者一樣，是從唯心主義出發的，竟至於達到了『小說創造世界』的結論；對藝術性也比較忽視，創作實踐沒有多大成功。他們不能正確處理向西方學習和繼承民族傳統之間的矛盾，對於中國古典小說一筆抹煞，這又是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本質上買

辦性一面的反映。他們的『詩界革命』運動，鼓吹甚力，成功却不大，最上焉者如黃遵憲，還做到了『詩界改良』，下焉者不過堆砌新名詞而已。他們反對桐城文章，提倡漢、魏、六朝，實際上則是梁啟超的富於煽動性的、夾雜大量歐化成分的政論文字，風靡一世，號稱『新民體』，在廣大青年中完全代替了桐城派的地位。他們大同之中又有小異，例如奠定了近代認真的翻譯事業的嚴復，就祖宗尚桐城文章；又如王无生以及新世界小說社報的論者，對中國古典小說就作了很高的評價。

洋務派官僚張之洞的文論，主要論點都針對着改良派。他痛斥龔自珍以來提倡六朝之風，是『怪民』『戾氣』，是『妖』，是『亡國之音』，公然主張加以政治迫害。他否認時代的變化，硬說當時還是『六合清晏』，立所謂『雅』為永恆的標準。這一套並無新鮮之處，倒是他把宋詩派也斥為『江西魔派』，可見統治階級內部的離心傾向更有所發展。

桐城——湘鄉派這時的骨幹，所謂曾門四弟子（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他們一致擁戴曾國藩，捧得最高的說他跨越方苞、姚鼐而直接韓、歐，最低的也說他是唯一繼承姚鼐而能為桐城派振衰矯弊的人物。他們在曾國藩死後，政治上都依附李鴻章，與洋務派的關係非常密切，薛福成本人就是洋務派中著名人物。所以他們不僅繼承曾國藩，以直接為反動政治服務的『經濟』，代替『義理』空談，而且努力殖民地化；例如吳汝綸公然主張青年專讀『西書』，中國一切古籍都可廢，只要留下一部桐城派的寶典古文辭類纂，與『西書』同時誦習。吳汝綸又痛斥龔、魏、康、梁的『縱橫之文』，不像上個時期，被曾國藩列入桐城派的洋務派官僚郭嵩燾，還盛讚魏源，引為同調。曾門四弟子之

外，桐城—湘鄉派這面旗幟之下，和它的周圍，大抵都是極反動的人物。例如王先謙就是湖南最大的豪紳，從變法運動直到辛亥革命，一貫站在反動陣營的最前列。

王闈運和李慈銘皆略承「文筆論」之餘緒而反對桐城—湘鄉派，都自視極高，而實際成就和影響並未能逮。李慈銘還不廢龔、魏，王闈運則已走到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絕路。俞樾之學，不名一家，和王、李二人其實也不怎麼相近。他能注意到雜劇，能欣賞七俠五義，是正統文人中有些識見的。常州詞派自張惠言發源，這時大有發展，代替了浙派的地位。他們講「寄託」，講「意內言外」，「比興諷諭」，要有重大的政治思想內容，又要通過一種「重拙大」的美的形象，作含蓄曲折的表達。

實際上這是一種對待世變的態度。這樣才能做到譚獻所謂「於憂心念亂之時，寓溫厚和平之教」；而這種態度又基于一種看法，他看出鴉片戰爭以來的世變為前古所未有，可是認為「同治中興」已經扭轉局勢，「將卜天下復見太平」。朱祖謀在八國聯軍大屠殺之下的北京，閉門專力學詞，據王鵬運說，他的詞境從此日渾，氣息日靜，格調高簡，風度矜莊，正是實現了譚獻的理論。可是辛亥革命之後，朱祖謀以遺老之身，眼見清朝復辟無望，逝世前的絕筆，所謂「泡露世，水雲身，枉拋心力作詞人」，便只剩下淒厲酸澀了。

宋詩派這時也大有發展，理論體系形成，最愛談理論的是陳衍。他準確地說明了宋詩是「寂與困者」之詩，創作方法是「有別才而又關學」，最高境界是「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而對於痛罵宋詩派為「魔派」的張之洞，也反唇相譏，說他是「大人先生之性情」。後來成爲這一詩派最

後一個大師的陳三立，原是變法運動的積極參加者，變法失敗後，才專力爲詩。他自己說：「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於自嘲中有自負。梁啓超說他「竟作神州袖手人」，則於同情惋惜之中，又似有批評和論定之意。

這一時期文藝思想上鬥爭的結果，肯定了文學必須變，而對於怎樣變的問題，則在「中西」、「雅俗」的問題形式之下，開始接近了封建文學和民主文學這個本質的矛盾。不過改良派沒有能力鮮明地提出這個矛盾，距離解決當然還遠。

三

第三輯六個單元：一、章炳麟；二、南社；三、國粹學報等；四、抱殘守闕者流；五、王國維；六、魯迅。

這一時期的主要內容，就是辛亥革命的準備、爆發和失敗。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民主派，早在中、日戰爭後，和改良派差不多同時開始了活動，起初還帶着相當重的改良主義色彩；戊戌變法失敗後，開始擺脫改良主義的影響；義和團失敗後，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組成了，正式提出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目標，號召人民羣衆進行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鬥爭。這時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由於義和團起義的教訓，不得不改變爲「共管」；而清朝政府也甘願做侵略者奴役中國人民的共同的工具，以維持自己的存在。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這個政府的統治，同盟會的主張日益得

到廣泛的擁護。改良派繼續散布君主立憲的幻想，和同盟會爭奪羣衆，但在遭到同盟會的駁斥和揭露之後，很快就被羣衆拋棄了。在同盟會的領導下，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終於爆發了具有偉大意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產生了中華民國和以孫中山爲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可是，由於革命派的缺點，由於他們沒有一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綱領，沒有廣泛地發動和組織人民羣衆的力量，這次革命很快又失敗了。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先前在洋務派大官僚李鴻章的羽翼下成長，以出賣戊戌變法起家，這時又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改良派進一步墮落，康有爲成爲復辟主義者，梁啓超積極幫助了袁世凱竊取國家權力的活動。從此中國進入各派北洋軍閥統治的時期，陷入極端混亂的局面。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進行了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鬥爭，沒有得到成功。直到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革命得到無產階級的領導，才結束了以上八十年舊民主主義的階段，勝利地進入新民主主義的階段。

中國資產階級在它最後一次領導革命的這個時期裏，革命性和軟弱性都表現得很集中。反映在文藝思想上，革命派做到了以文學緊密地服務於實際鬥爭，以強大的革命聲勢壓倒了封建文學；但是他們仍然沒有能力明確地提出和解決封建文學和民主文學這個本質的矛盾，給封建文學以摧毀性的打擊。被壓倒了的封建文學各派，仍能抱殘守闕，頑強地掙扎。

章炳麟是辛亥革命前有極大影響的革命文化大師。他主張革命宣傳文學應該「叫吽恣肆」，「跳踉搏躍言之」。他提倡科學的說服力和質樸的風格。他提倡「意氣發揚」「精爽陵厲」的詩風。他的全部

文學理論的最基本的精神，則在於宣揚漢族過去文化文學的光榮，以激發對於清朝的種族壓迫的憤懣。這是爲他的反清排滿的政治目的服務的。可是，種族革命論的狹隘性，大大限制了他的民主主義的水平，使他把繼承民族傳統和復古主義混爲一談，竟至於以古文字學爲文學的基礎，把文字和語言割裂開來，從而把文學和語言對立起來。所以，他雖是提倡革命宣傳文學的戰鬥性和鼓動性，却也許根本沒有把它當作文學看待；而真正論到文學時，仍提倡『雅澹』之風。五四運動後他反對白話文，也還是從文學和語言對立的觀點出發。他不理解龔自珍、魏源的巨大進步意義，斥龔爲『漢種滅亡之妖』，斥魏爲『惟善說滿洲故事』，更表現出種族革命論的狹隘性。

以柳亞子爲首的南社，集中了那一時代的青年歌手。他們政治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文學上革命浪漫主義的傾向，都是鮮明的。他們激烈地反對宋詩派，提倡唐音，但又並非王士禎、沈德潛用來『鼓吹休明』的那一套，而是龔自珍、康有爲、譚嗣同以來鼓吹變革、召喚風雷的那個傳統。他們鮮明地提出『民史』的口號，要以『布衣之詩』對抗官僚之詩。可是，他們終究是遠離人民的知識分子。他們鄙視農民起義，看不見羣衆的力量。革命高潮未來之前，他們急躁悲觀；革命剛有成功，他們又有些飄飄然，想象知識分子在革命隊伍裏應該享受『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的尊敬和『艷福』；革命失敗，袁世凱竊國，他們便『無所發據，則廣集海上，日夕歌呼飲北里』了。他們後來有很大的分化，『有些人甚至成爲新的運動的反動者』（魯迅語），也有人例如柳亞子則隨着中國革命的發展而不斷前進。他們爲了革命宣傳，大力提倡戲曲，其貢獻略可與改良派之提倡小說相比。他

們關於小說的理論，却不怎麼高明。黃人反對梁啟超以來主觀唯心主義的對小說的社會教育作用的過份強調，却走到唯美主義的路上去。金松岑和寅半生主張以正面理想人物教育讀者，而其理想往往有很大的封建性；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裏面說，有人大罵翻譯家不該把迦因小傳譯全，顯出了迦因戀愛懷孕的情節，他們正是持這個論調的。

鄧實主編的國粹學報，是『談學術而兼涉革命』（魯迅語），有很大影響的刊物，主要撰稿人是章炳麟和劉師培。劉師培始終主張『文筆之辨』，提倡韻偶之文，與章炳麟一度有此主張，旋即放棄者不同；而以古文字學爲文學的基礎，則是一致的。劉師培的文學理論中，民主主義的成份，比章炳麟更少；後來他就一變而爲清兩江總督端方手下的密探，再變而爲向袁世凱率先勸進的籌安會發起人之一了。田北湖的民主傾向，則似乎更多一些。至於民權素這個刊物，同國粹學報、南社都有聯繫，可是政治上更多地反映出辛亥革命失敗後民主派的潰不成軍，文學上則竟然走上鴛鴦蝴蝶派的一路。其他論者如姚華，只是大略相近，姑附於此。

桐城—湘鄉派，『文筆論』派，晚唐詩派，常州詞派等等，這時都在革命派的聲勢壓倒之下，實際上組成聯合陣綫，頑強掙扎，彼此也還有矛盾。小說翻譯家林紓，在清末介紹西洋文學有相當貢獻，辛亥以後，政治上上是清朝遺老，文學上則以桐城派的捍衛者自命，力竭聲嘶地咒罵革命派，特別集矢於章炳麟；後來五四運動時，他就成了封建文化向新文化瘋狂反攻的代表。

王國維政治上上是清朝遺老，學術上和文學理論上，則是五四以後中國資產階級學術和文學理論的

祖師。叔本華、尼采哲學，是他的文學理論的基礎。從否定人生出發，他提出距離美學、先驗美學、遊戲起源論、地理決定論、反功利論、反典型化等等一整套。後來中國資產階級文藝理論大致都沒有越出他的範圍。

這一時期文藝思想的鬥爭，充分說明了一點：中國資產階級在文學戰綫上，是起過反封建的革命作用的，可是它無力領導這個鬥爭達到徹底的勝利。中國資產階級文化上的軟弱，是政治經濟上的軟弱的反映，而文化上軟弱的程度較政治上經濟上更甚。

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達到革命民主主義最高峯的文學理論，是青年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提倡革命的浪漫主義，是這篇論文的中心內容。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戰鬥的民主主義，是它的基本思想。繼承民族傳統和反對復古主義，學習西方文學中的戰鬥精神和批判西方文學中的奴化思想，是它要解決的兩個主要矛盾。把自己的個性解放同人民羣衆的解放密切聯繫起來，把同情被壓迫者的不幸和鼓舞被壓迫者進行抗爭密切聯繫起來，所謂『苟奴隸立於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是它的革命性的集中表現。雖然它的世界觀基礎還是唯心主義的，社會思想還是進化論的，還受了尼采哲學的影響，可是已經有一種強烈的力量急欲突破這些體系。文末有云：『少年處蕭條之中，即不誠聞其好音，亦當得先覺之詮解；而先覺之聲，乃又不來破中國之蕭條也。然則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這是迫切的追求，熱情的期待。歷史終於回答了這個期待，十月革命一聲砲響，馬克思主義的先覺之聲破空而來，中國之蕭條頓破，當年沉思着的青年，終

於成爲新的文化革命的主將，從魏源、龔自珍到章炳麟的未竟之業，在新的文化革命中得到最徹底的勝利。

八十年文藝思想鬥爭的過程極爲豐富，以上所說却極爲粗略，還可能有許多不對的地方，好在二百四十餘篇資料本身具在，糾正不難。資料選錄也可能多所遺漏，編次也可能不妥，則要請研究者指正。

舒 蕪

一九五九年八月